

442550

史学争鸣录



史 学 争 鸣 录

一九八二年五月

说 明

为了配合本院历史系的教学，活跃学术研究，向师生提供资料，本馆从全国报刊上选取有一定代表性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历史研究论文文摘及综述，辑录成《史学争鸣录》一书，供师生参考。

限于水平和时间，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曲阜师范学院图书馆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1
谈谈解放以来史学界的某些口号	2
史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4
略谈“史”与“论”的关系	5
吴大琨提出，历史上的社会生产方式是 六种，而不是五种	7
张广志认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 的必经阶段	8
历史研究不能“打倒王朝体系”	10
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	11
对“我们的奴隶社会起于夏代”的质疑	12
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	13
杨际平认为，井田制和私田制各为我国奴隶制与 封建制的经济基础的说法不妥	15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些问题	16
周谷城说我国封建社会从东汉开始	18
中国封建化过程的特点	19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21
封建长期，似乎不长	22
谈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23
谏议与君主专制制度	24
试论我国封建社会的改良	26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27

不能苛求历史人物	28
如何评价反面历史人物	29
平均主义对农民战争的作用	31
评价农民革命领袖，不能以平均主义口号为最高标准	32
关于民族英雄的不同见解	34
✓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35
✓如何看待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独立政权	36
历史上有没有农民政权？	38
农民战争不是历史发展的“阻力”	39
农民领袖蜕变是历史的必然	40
如何看待农民的“天命”思想	40
西周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	41
李泽厚就孔子评价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见解	43
春秋“信”观念的兴衰	44
孔子没杀少正卯	45
要正确评价孔子	46
骆承烈对颜回的评价上提出了与郭老不同的看法	47
罗世烈说孔孟之道和秦皇汉武之政完全是两回事	47
古代井田制是孟轲的“美妙幻想”	48
✓重评战国变法运动	50
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新解	50
刘邦是“农民起义领袖”吗？	52
不能完全否定项羽	52
批判江青必须否定吕后吗？	54
范传贤认为西汉是奴隶社会	55
对王莽的不同评价	56

王莽与刘秀	57
重新评价刘秀的功过	58
曹操应不应该翻案?	60
淝水之战是苻坚发动的民族征服战争	62
武则天的千秋功罪	63
岳飞之死	64
“澶渊之盟”新见	66
要正确评价司马光	67
陈昌福提出，成吉斯汗基本上应该是一个否定的人物	69
陈高华认为，朱元璋不配称为“元末农民战争”杰出领导者	70
论明初皇权专制的加强	72
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斗争的经验教训	73
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再评价	75
朱元璋不存在蜕变的问题	76
关于李自成隐居夹山说的不同意见	77
评《甲申三百年祭》	79
朱元璋用人的经验与教训	81
怎样评价《甲申三百年祭》?	82
为郭老说句话	83
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	85
如何评价史可法	86
实行过激政策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88
韦昌辉“功大于过”	88
论天京内讧中的关键人物陈承镕	90
要全面评价李秀成	91

不应全盘否定左宗棠	91
甲午黄海海战的几个问题	92
对宋景诗的不同评价	93
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95
以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和现代史上限的分 界线是不恰当的	96
✓ 怎样认识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97
光绪执行的是洋务派路线	98
如何评价光绪皇帝?	99
✓ 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	100
立宪派也有功	101
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	102
✓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103
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	105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光绪	105
对义和团源流的不同看法	106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和盲目排外的一种见解	108
怎样估价义和团运动的反封建性质	109
怎样看待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10
在亚洲打落了第一个皇冠	111
✓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112
黎元洪是怎样被拥立为都督的?	114
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	114
五四时期反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	115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	116
最初的国家都不是奴隶制国家	118

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无中心？	118
论巴黎公社的政权性质	119
正确认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	121
十月革命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吗？	122
甘地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123
当前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124
一、要加强对宏观历史的研究	124
二、不能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与 旧式农民战争相混淆	125
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农民起义中的 平均主义思想	126
四、不能把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归咎 于农民战争	127
五、评价帝王将相的主要标准	128
六、不苛求古人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 物的重要原则之一	128
七、正确看待国内民族斗争中的英雄人物	129
八、气节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	130

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历史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做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去任意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史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才能够建筑辉煌的科学殿堂。历史学家必须收集和掌握丰富的资料，进行整理、考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掉蒙在史料上的重重迷雾，使史实显露其本来面目。

有一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坏科学性。其实，“只凭史料说话”，仅仅在某些陈述简单事实的很有限的领域中可以做到，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当我们试图对历史过程作某种分析判断时，对一条史料也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见，对史料的陈述和解释离不开各种理论观点的影响，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理论观点的影响。

也有的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会束缚研究工作，妨碍人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这至少也是严重的误解。马克思主义不但不会窒息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才使人们的思考富有成果，使讨论更加生动活泼。

建国以来，史学界在历史研究工作中获得了很大成绩，

也走过不少弯路。开始是为了纠正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而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以后又为了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实史料的倾向而提出“论从史出”的口号。这两个口号针对历史学界的不同情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从史出”，从认识的根源来说是正确的。历史理论不是在某些理论家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历史事实。只有深入研究历史实际，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理论。“论从史出”对于纠正那种不肯在史实史料上下苦功夫，只凭背诵几条语录就乱放空炮的错误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口号没有表明理论在研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

“以论带史”，语义更欠明确。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理论观点居于历史实际之上。但是，如果把“以论带史”理解为不很确切地表明了理论对历史的指导作用，那末，这一口号正好和“论从史出”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我们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因此提出了“论从史出”；同时，我们又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提出了“以论带史”。

我们主张“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

（摘自1981年4月2日《人民日报》）

谈谈解放以来史学界的某些口号

解放以来史学界出现的某些口号，我一直感到莫名其妙。

第一个口号，约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叫做“打破王朝体系”。虽然讲的人很多，但未见任何人阐释这个口号的确切

涵义。王朝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谁也不能抹煞。要说明一个时代，必须详细研究其生产力状况、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状况，不是一顶帽子概括得了的。

对这一口号还有另一种解释，叫做“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如果认为从来的历史都写的是英雄豪杰、圣君贤相的历史，而我们则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这样的颠倒是必要的。但如果认为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都应该一棍子打死，起个总名称叫“封建僵尸”，谁要是把他们写进书里、戏里，谁就应该挨批，那就不对了。

第二个口号大约出现在一九五八年稍前，叫作“以论带史”，对这个口号各有各的理解，无公认的定义。假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来指导历史研究，我是赞成的。如果认为用马恩列斯毛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历史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框子，千方百计地将历史事实当作物品塞进这个框子里，我是不敢苟同的。

第三个口号是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叫做“厚今薄古”，是陈伯达发明的。有的认为“厚今”是用全部力量来研究今天。还有人说得比较圆通一些，教人不要搞古代史，否则就给你戴个“厚古薄今”的帽子。要做点学问，不进行一点历史的探讨是不行的。研究古代史直至原始人史，只要能取得科学成果，未尝不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四个口号叫做“古为今用”。历史发展是一条长河，没有上游，即无中游与下游。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过程，自有其本身规律。各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人物、事件、经验、教训。假如我们客观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科学地解释历史就可能使现代人获得真正的历史知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

果不是这样理解，而是“借古喻今”，那就不好了。那不是科学地研究历史，而是让古人演现代戏。不是搞历史，而是演政治戏。

解放以来，历史界的口号当然不止这一些，还有一个有很大影响的提法，即“农民革命”和“农民政权”。马克思主义说的革命是指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不变革社会制度就不能叫革命。从社会制度变革的意义上说，有没有“农民革命”呢？怕没有吧。没有“农民革命”，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农民政权”了。

（摘自《群众论坛》1981年第2期。）

史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最近史学界提出了一些问题，虽然提这些问题的是少数人，但却代表了一种倾向，值得注意。

第一、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得非常明确，向来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直接动力、伟大动力；现在提出生产力才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不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那么，还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正确性呢？生产力不能说明历史，科学技术不能说明历史，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说明历史，能把纷纭复杂的历史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来。如果阶级斗争学说不灵了，历史又怎样说明？

第二、史料和理论的关系问题。过去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有人提出“以论带史”，这种先有观点后套材料的主观

唯心主义治史方法，被史学界大多数人否定了。但是，在纠正“以论带史”的同时，有人却提出“论从史出”，这缺乏一个指导思想，即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

第三、历史研究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有的提出研究历史不要提为政治服务，不要提古为今用，有的则明确提出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

第四、用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吹捧资本主义，有的甚至说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另一方面，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把农民战争也否定了，说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历史起了破坏作用。

第五、抬高改良派，否定革命派。过去对改良派全盘否定当然是错的，但不应把改良派抬高到革命派之上。

(摘自光明日报《情况反映》80年第1094期)

略谈“史”与“论”的关系

“史”和“论”的关系，是史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有过“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两种意见。后来又有了“史论结合”的论点。这几种意见的提出，都是针对当时史学界存在的某种倾向的，都有其积极意义，但每种提法都存在一些问题。“论从史出”的意见，被人认为是“史料即史学”的翻版。“以论带史”，是否会陷于教条主义，而走上“以史注经”的老路。“史论结合”，如何结合法，究竟二者以谁为主？三种意见争论很久，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我认为，“史”与“论”的关系，不仅涉及到方法论，

其实质即哲学上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历史是既成事实而又不可改变的客观的存在，是第一性的。而文字记载的史料，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派生的东西，所以是第二性的。虽然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和认识水平不同，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史料毕竟是从具体的歷史事实而来的，只要经过科学的鉴定批判，就可以通过它去认识、分析历史，从而得出正确或接近正确的结论。这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所以，研究历史，应当首先重视史料，力图通过史料去求得结论。而唯心论者对于一个历史问题，首先抱有某种看法或见解。这样作出的结论，根本就颠倒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其结论必然是武断的，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任何历史问题都作出答案。如中国封建社会究竟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中国封建社会自东汉以来常出现宦官专政的现象等。这些问题，需要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是，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为了掌握它的全面情况，首先必须广泛的搜集各方面的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认真的批判和分析鉴定它的真伪，或文字有无讹误等等，然后才能利用这些史料去分析历史事物的性质、内容、形式以及各种的相互关系和它的发展变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每一步工作虽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指导，但如缺乏史学的修养，不能在史学基本功上下功夫，那仍然只能在历史唯物论的原有阵地上兜圈子，不可能在史学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史”和“论”的关系，如果从哲学上的存在与思维的

关系以及唯物论的反映论去处理，就可以得到解决。这样，“论从史出”等几种不同的提法，从内容上就消除了根本性的矛盾，倒反而可以互相补充、结合了。如果是历史的专题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下，针对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了精密的分析研究，是可能实事求是地概括出一些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甚至新的规律来的。如果是叙述性的著作，仍以按照夹叙夹议的“寓论于史”的方式为好。

（摘自1981年6月8日《光明日报》）

吴大琨提出，历史上的社会生产 方式是六种，而不是五种

《学术研究》1980年第一期刊登的吴大琨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历史上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六种，而不是五种，应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研究。文章认为，历来人们都讲生产方式有五种，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社会主义制，很少有人讲六种生产方式的。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序言》中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所以说，马克思确实主张过在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以前还有一个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加上原始公社制，就是六种生产方式。

文章不同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公社制。因为马克思所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已经形成国家，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租税，不能说是原始公社制。文章又

说，过去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不发达的奴隶制的说法也有缺点，需要重新考虑。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能从不发达的奴隶制发展成为象希腊、罗马那样发达的奴隶制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这一著作中，是把亚细亚的、即东方的和古典的、日尔曼的生产方式作为平列的生产方式看待的。在亚细亚的国家里，主要生产者是农民，在古典的希腊、罗马生产方式里，主要生产者是奴隶，而在日尔曼的生产方式里，主要生产者是农奴，这三者在身份上是很不相同的。文章还说，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从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的单线发展。实际上，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原始公社制崩溃后，由于生产力低下，地理条件不同就出现过诸如亚细亚的、希腊罗马的、日尔曼的不同发展道路。就我们中国来看，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才由初期亚细亚式的国家发展成为真正中央集权的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亚细亚式的国家。

（据1980年4月9日《光明日报》）

张广志认为，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奴隶社会是否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一个争论的老问题。《青海师范学院》1980年第一、二期刊登的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

作了否定的回答。

作者认为，不应固执原始社会必定发展为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又必定发生在奴隶社会之后的成见，而应该看到封建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脱胎而来的。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可能的、正常的，而且它比起通向奴隶社会的那条发展道路来，还显得更平坦、更宽广和更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意义。

作者认为，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地区，的确有过奴隶占有制会，但不应忘记，这里的奴隶制社会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公社制度的彻底瓦解和私有关系的充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等）之上的，而这些条件又是刚刚从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大门的大多数民族所无法具备的，因此，奴隶社会由于它所要求的条件过于“苛刻”，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在世界范围普及开来，为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所接受，而只能把自己局限在地中海沿岸的一隅之地。

作者还论证了地中海沿岸以外的广大地区的非奴隶社会的发展道路，而以古代东方为代表。通过多方面的史实的和理论的分析，作者断定：在古代东方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虽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但居于主导地位的却是封建经济，因此，有充分根据写下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的结论。

总之，在作者看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事实上，不经过奴隶社会是广大地区的通例，经过奴隶社会则见诸极个别地区，是变例。以变例为通例，是以偏概全，是十足的西欧中心论。

（据《光明日报》1980年7月2日）